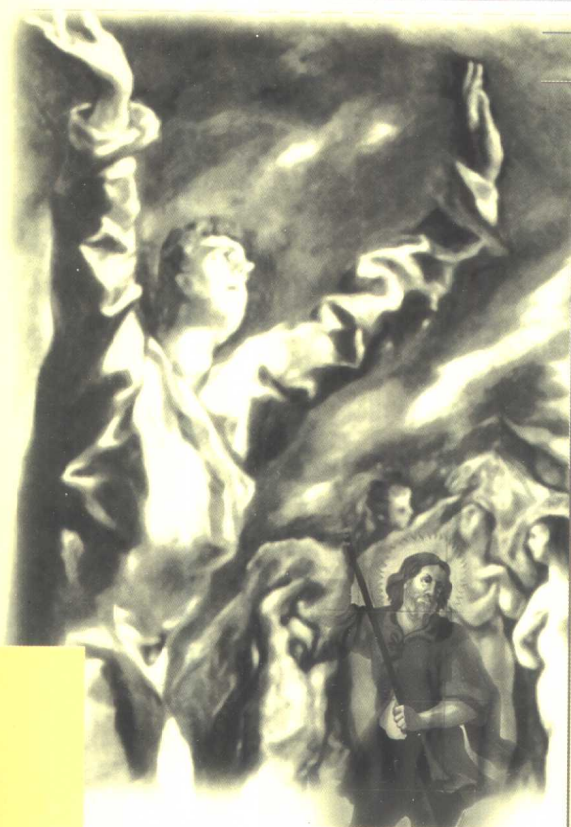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 著 田 洺 译

追问千禧年

世纪末的理性探索



科学人文丛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科学人文丛书



追问千禧年

世纪末的理性探索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 著 田 洺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1997 by Stephen Jay Goul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问千禧年:世纪末的理性探索/(美)古尔德著;田
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
(科学人文)

ISBN 7-108-01372-X

I. 追… II. ①古… ②田… III. 世纪-交替-社会心理
-通俗读物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980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字 数 9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8.00 元

诚挚地纪念

我的朋友卡尔·萨根——

我们这个时代
最具热情的理性主义者
我们这个千禧年
最出色的科学倡导者



《最后的审判》(1536—1541)局部,米开朗基罗。

译者序

有关宗教、迷信和科学的断想

本书的作者斯蒂芬·杰·古尔德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动物学教授和地质学教授,纽约大学的客座生物学教授,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古生物学部主任;同时他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科普作家。(细究起来,科普作家这个称呼之于他并不准确,因为他的一些写给大众看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为了普及他所知道的科学知识,其中还含有丰富的入道主义情怀和学者的风范,他利用这类作品,更主要的是要倡导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1950年,古尔德8岁时,受到当时出版的一期《生活》杂志上纪念世纪过半文章的启发,开始思考即将到来的千年转换——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又叫千禧年转换。直到过了将近50年后,他才提起笔写作有关千禧年问题的专著。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和他的读者一起分享了对三个千禧年问题的生动探索历程。首先,千禧年的确切概念是什么,以及这个概念怎样转变了涵义。一个专指基督行将再次统治世界一千年的名称,怎么变成了当代历史中世俗社会的千年转换名称?其次,千禧年什么时候开始,是2000年1月

1日,还是2001年1月1日?最后,为什么我们制定出这样复杂的历法,并不断探讨历法中所含的人为赋予的规则,甚至为人为制定的日子而激动,包括对千禧年的狂热?

古尔德利用他的智慧和博学,将千禧年的故事,以及由千禧年所引发的其他故事,讲得生趣盎然、丰富多彩。从他那灵巧的笔端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幅充满哀伤、然而却丰富绚丽的千禧年狂热的历史画卷,以及历法制定和演变的有趣历程。千禧年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中重要的末世论思想,古尔德对于这种末世论并非单纯的谴责,更没有简单地声讨,而是继承了他一贯的风格,严谨、客观地利用科学中所富有的理性主义精神,剖析了千禧年观念的由来及其造成悲剧的原因;并进而对于文明、文化和社会中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示。古尔德通过对于一些细小问题的清晰阐释,重申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人类将太多的愿望、祈求、癖好、偏见和个性化的理解赋予了这个世界。

作者的敏锐、博学和犀利,似乎也感染了转译他作品的人,引诱着译者的思绪,像少男少女一样难以安分。然而我却不能、也不应该像前辈林琴南那样,夺作者之笔,在正文中假作者之名来抒发。所以借助译者题序的机会,记下由作者和作品勾引出来的遐思。

—

古尔德的这本论述基督教千禧年思潮的小书是应时之

作——针对的问题是时下西方人热衷的问题，但是书中表达的思想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然而，就在该书译完之际，未曾想它在中国突然成了一部“应时”的译作——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超越了空间的限制。

之所以说“未曾想”，一是因为基督教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并不巨大，二是因为没有想到来自民间的异端会突然给我们这样的国度带来这样大的冲击。我本以为一部关于基督教千禧年文化的小书大概只会引起少数好学者的兴趣。

尽管从明末以降就有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播“福音”——其中就含有千禧年的思想，但是即使是现在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祷告的虔诚信徒，也并非都能真正理解千禧年的基本（遑论是深刻）内涵，更不用说是一般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了。虽然我们的商家也在用“千禧”或“千禧年”这样的招牌去招徕顾客，出现了什么“千禧”牌葡萄酒，（是基督的血吗？抑或这家酒厂的老板是个虔诚的教徒？）开辟了“千禧年”旅游路线（是去基督再次降临后所建立的那个幸福王国吗？还是去基督的诞生地或者升天地朝圣？——请好事者不必认真，说这样的话纯属嬉戏），但是我想顾客当中很少有人会将他们手中的商品或即将奔赴的行程与两千年前中东的那个历尽艰辛、痛苦而去、据说又会再次降临的圣人联系起来。更鲜有人响应千禧年这种脱俗超凡的召唤，放弃即使不太荣华的生活，去奔向那敢于想像但却不敢于尝试的彼岸生活。（我们虽然没有很浓厚的基督教传统，但是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其他形形色色的末世论。）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的体系，它宣扬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神，世界由神创造，并由神来控制。从形式上看，世界上的宗教大抵如此。然而，从社会作用的角度，宗教又都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规定人的道德伦理的作用。一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经过哲学的改造后，已经将信仰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几乎所以宗教都有对彼岸世界的描绘，意图是要克服或者抚慰人们生时的最大恐惧——死。任何宗教都曾经出现过舍身取义的信徒，我国的佛教和道教也不例外。不过，在我国，世俗化早已侵染了任何传入或生于本土的宗教，加上国人天性敦厚温和，罕有极端过激的举措，所以为超验的信念而殉道者向来稀少。

然而，缺乏宗教情结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实在难以说的清楚。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五千年（也有人说是六千年或七千年）而未中止或中断过，并且至今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公元前有影响的文明差不多都消亡了，除了希伯莱文明中断后又于近代恢复，此埃及、希腊、波斯、罗马、巴比伦等已不是彼埃及、希腊、波斯、罗马、巴比伦，公元前还没有欧洲这一概念，阿拉伯文明的种子还深藏于近东沙漠的一隅，尚未萌发；公元前的印度文明也和现在的文明之间形成了断层，现在印度的寻常老百姓基本上无法读懂他们公元前的祖先用梵文或巴利文撰写的文学或历史，而我国的多数学童可以大致认识公元前的孔子和老子撰写的文字。现代汉文字与更古老的甲骨文和金文之间是一种渐变的关系，而不是剧变或者替

代的关系——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亲子，而不是继子，更不是养子。我们的文字延绵的历史最长久。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因此从文字的角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明延绵的历史最长久。）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宗教文明，我们的文明很早就深深地根植于现世生活中，我们不会为了脱离生活的信念而放弃生活。

我们敬神拜佛，更多的是为了祈求多子多福、逢凶化吉、娶亲嫁女、升学升官，为了护佑我们平安顺利，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或借助想像中的神或者鬼或者魔的力量来惩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奈他不得的对手和敌人，而不是为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们敬天畏地，是祈望风调雨顺、生活安康；我们的道德就建立在生活本身的基础上，建立在亲戚邻里的认同基础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超验的（某种情况下也是经验的）东西在关注、凝视着我们，也会（实际上是我们以为会）惩戒或者褒奖我们，但那不是神，而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不是开拓性的，而是守卫型的，我们珍惜、敬畏甚至玩味我们的先人留下的遗产，这种心态不止限于文人，不止体现在读书人对故学的深爱中，而且也存在于我们普通人中，也体现在平常老百姓对祖先的缅怀和敬畏中；我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而不是在对未来的畅想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我们对人的关心，一般是始于个人，止于亲朋，缺乏对广义上人类的关心——“人类”这个概念太形而上了，超出了我们的真切体验。

这种文明不会由于理念或信念的改变而使人们放弃生活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任何朝代的更迭，经过短暂的慌

乱和迷惘之后，很快就会一切如常。民众是看戏的，人生舞台上的你来我往不仅不会使他们乱了生活的阵脚，反而会增添他们生活的乐趣。我们太热爱生活了，凡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我们早就做的很好、甚至最好：我们有令世人垂涎的美食和佳酿；在其他民族还在着麻衣粗布、植物皮叶或者动物皮毛时，我们早已穿上绫罗绸缎；我们有自己的医学体系，而且还曾长期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我们的诗歌差不多咏遍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生活中的任何角落几乎都没有被我们的文学放过；我们甚至有复杂的房中术，使我们的隐秘生活也多姿多彩；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亲戚称谓，我们很早就善于、乃至精于处理“公共关系”。我们太留恋生活了，即使外界条件非常恶劣，我们民族特有的韧性也会帮助我们渡过其他民族无法想像的难关。

我们的文明就化在人人都须臾无法离开的现世生活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动，只要略有安定，我们就会很好地去生活。即使是侵入的外邦异族，也为这种丰富而精妙生活方式而折服，他们何尝不想以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取而代之，但是太难遂愿，无奈，由它去罢，或者干脆随它去吧。在我们的历史上，征服汉民族的民族，最终都要在被征服的地域以及自己原来兴起的地域使用我们这个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文字，甚至制度、官员、司法习惯、价值标准、教育体系和生活方式。真不知道是谁征服了谁。还有比根植于生活本身的文化和文明更有包容性和宽容性的吗。（不过，还应该提到的是，我们比较幸运，历史上征服我们的异族都是些比我们更野蛮的民族。）

二

然而，我们对生活、对周边环境和人生的境况及未来也有不解、恐惧和无能为力，我们也会体会到无助、渴望、焦虑的情感。由于我们的文化过于注重经验和实用，而忽视超验和非功利的理论，难以建立起严谨的理性思维体系，所以我们缺乏有利于克服生活中恐惧的理性工具（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古代的科学技术不是很发达吗？诚不敢苟同，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发达的是技术，而不是非实用的、作为理性思维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再者，科学只是理性思维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便常常仰仗非理性的工具。

宗教和迷信所占据的领域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它们都相信某种神奇的力量。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彼岸的神，而迷信则相信有限、有形、现世的神，因此宗教的信仰基础远比迷信的信仰基础牢靠。宗教比迷信更具超脱性，宗教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只起到约束作用，并不主张人们彻底放弃现世的生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早与迷信抗争的是宗教（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常识中，经常有人混淆了宗教与迷信）和哲学。然而，纵观我国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一直很孱弱（一些重要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教派，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而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迷信（有时是以宗教的名义，而且即使有所谓理性，也是脆弱的）却很流行。

如果从一些宗教的演变历程看，宗教也有其发生、发展

和成熟的过程。初期的宗教(或者叫原始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并不等于说凡是迷信最终都会演变成宗教,而且即使是宗教也不是永存的,或者一定是对人类有益的。

迷信是偏执狂或将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野心家鼓噪的运动。迷信的始作俑者故作关怀芸芸众生,夸张了人们经历的生活苦难,认为这种苦难的根源不在现实,并自封为先知和拯救者。他们经常闯入其他领域,信口雌黄,主张不可知论,不知天高地厚,窃取其他名义,散布恐怖。迷信是“魔鬼出没的世界”,是贱本的赌博,是载着我们驶向被美化荒岛的经过粉饰的废船(船票廉价甚至免费,但是乘客难以中途下船)。迷信的倡导者并不像宗教的创立者那样坚信自己所倡导的信念,坚持自己提出的行为准则。迷信宣扬个人的无能(相反,却宣扬他本人无所不能),宣传不加思考的遵从,渲染幻象的力量。由于迷信,我们将某个现实中的人造就成神,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他(或她),希望他不仅照料我们的今生,而且也负责我们的来世;我们将某些人的能力神话,赋予他本不具有的禀性,希望他解决他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但愿不是弄得更糟)——也许谁都无法解决,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将一些符号神化,希望一些数字、文字或者图形,给我们带来好运,或者避开一些符号,生怕遇到那些符号像踩上地雷一样,毁灭我们的前程;我们放弃理解的力量,将不解的现象归因于某种超验或奇迹的东西。我们敬畏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我们畏惧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鬼,我们常常陷入了自己编织的

圈套——正像罗斯福所说,人们所恐惧的其实是恐惧本身。我愿加上一句:人们所敬畏的其实也是敬畏本身。

敬畏是迷信的基础,也是信仰的基础。人的确需要信仰,诚如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所说,人有信仰,才有力量,人有力量,才能坚强。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信仰是聚合群体的凝聚剂。个人也许可以没有信仰,但是群体不能没有信仰(或者迷信)。(信仰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如果不理解就相信的话,那种行为本身也叫做迷信。)然而,当我们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又不会再像我们的古人那样信仰先人,不愿像西方人那样去信仰一个过于抽象的上帝,不能信仰科学的时候(尤其对一个人口中只有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还姑且不说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的国度来说,希望或者要求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实在有些难为众生),自然会为其他的信念留下空间,会为宣扬邪说的人提供大量的受众——尤其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遭遇到未曾熟知的内心不安、现状不平、境况不稳、前途不定时,迷信的鼓吹者可供利用的就不仅是土壤了,简直就是温床!

如果迷信者如云的话,信奉者又将体会到群体的慰藉,尤其在心灵冷寂又无所依托的时候。而且群体本身又构成新的压力,使得怀疑者害怕遭到唾弃,批判者害怕遭到围攻。我们恐惧孤独,思考的惰性又使我们宁愿放弃思考,所以我们干脆去听从众人——其实如果人人都这样去想的话,所谓众人的想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或少数几个煽动者的想法。思想上的偷懒往往会导致生活上的偷生。天底下

可不乏愿意充当领袖、愿意替别人思想、愿意替别人做主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尝言,人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剥夺,惟有思想的自由不能。也许他低估了迷信(以及其他什么)控制思想自由的力量,有些迷信就曾经(相当巧妙地)剥夺过思想的自由。

我国目前的非理性迷信盛行直至酿成重大的社会震动,实在有它的渊源和土壤。对此,很需要有人突破表象的屏障,避开俗套的说法,做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阐释,而不要仅限于声讨、控诉和忏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指责对方信什么(无论是迷信还是宗教),而是要分析为什么要信那些,而不是这些;尤其当有些迷信的信念基础和内容相当幼稚还有很多人相信时,更能反射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的信仰如此苍白,为什么信仰的领域如此荒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从历史上看,迷信运动常常成为某些人或者利益集团试图实现政治抱负的载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20年来,或者从更早时起,凡是当遇到来自民间(相对于学术界或……)的不和谐思潮冲击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科学(但愿不要只是这时才想到科学)。的确,清除迷信,需要依靠科学。科学——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有体系的知识,科学依靠的是对事实的观察,同时科学的理论要经过逻辑和事实的验证。正如古尔德在这部书的扉页中所题献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热情的理性主义者”和“我们这个千禧年最出色的科学倡导者”、美国著名科学家及科普作者卡尔·萨根所说,“科学”是

“照亮黑暗的蜡烛”。科学有助于解惑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但是关键是依靠什么样的科学,或者说依靠科学中的什么。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国内外的迷信追随者当中并非没有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人,有些人甚至是博士、教授或者更高学衔的人,其中不少人甚至是笃实的信徒。这一现象着实让一些人费解。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并不一样。科学在我们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我所敬重的朋友贾新民先生在《三思评论》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五四”运动时期所谓的科学和洋务运动时期所谓的科学不是一回事),当下上到政府官员,下到黎民百姓,还有学人,都在大谈科学,但是他们所说的科学是一样的吗?

科学包括科学的理论、事实、方法、精神,以及科学的价值观。在我国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上重视的是科学的理论和事实的教育,而匮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精神教育,即使是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常常是由于流于形式而失去魅力和效力。我们重视科学中的可用成分(很多人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技术,至少是应用科学),而不太重视科学中不可用的成分。一些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或者在其他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但是却淡忘或者根本就没有受过科学精神熏陶的人,有可能会让予自我思考的能力。尤其在科学分科非常细致,科学的训练与徒弟学手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的今天,有些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其专业以外的知识水平与其他人无异——如果不是更糟的

话。(其实即使我们的科学教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不应该期望、或者自认为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人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是无所不能。而且,正是由于后文谈到的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以及个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所以对于一些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信念及信仰超出普通人的预期这样的事实,也就没有必要感到惊奇。)于是,一些科技工作者会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或者比他们更甚,他们像浮士德一样,与魔鬼做交易,追随高超的煽动者。只不过这些科技工作者比别人多些自信和辩解的能力罢了。

简单地说,科学方法是该行业从业者共同遵循的工作方式,科学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不盲从任何权威,只依赖于理性。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不规避任何领域,它指向人类的一切认识,它怀疑一切,它批判一切,乃至科学本身。有些人,尽管不是科学家,但是也具有、甚至富有这种精神,比如马克思和韦伯,陈寅恪和钱钟书。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应该相信任何迷信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当面对由国家工具所支持的迷信时,更是如此,典型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时科学家的作为。(另外,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有时科学也受着人们主观意识的驱动。)

只要没有在民众之中形成坚持理性的怀疑和批判风气(不幸的是,在我国,目前即使在科学界内部这种风气也不多见),那么想要彻底破除迷信本身就是一种迷信,想要涤荡非理性思潮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愿望。然而要